

## 「哲學教育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 專家對話(三)

#### 回應苑舉正教授

#### 林維杰

苑舉正教授的宏文〈哲學教育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以台灣高等教育為例〉提到很多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內容。其中不只涉及哲學在台灣作為「教育」一環的發展困境，也涉及「哲學本身」為何。

文章中所說的發展困難(定義、應用與理解)與挑戰(商業化、科技化與民主化)，分屬於內在與外在問題。我很贊同苑教授在這兩方面的解讀，但另有兩點補充：首先是關於哲學的定義問題，其次是哲學教育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就第一點來說，「哲學是甚麼？」歷來一直是教師在課堂上費盡腦力的課題。苑教授從哲學教育的角度把「哲學」解釋成從事於「思考」，當然也是一種解答，但「思考」本來即是所有學問的追求都應該從事的目標(尤其是大學階段)，並不限於哲學。除非哲學教育啟沃的是「思考如何思考」，否則我們理應找出哲學思考的特別之處。我個人認為傳統歐陸哲學與中國哲學提及的基礎性(形上學)、終極性(包含真理問題與宗教向度)與善的生活(倫理學)等內容，



比較接近一般我們認知與接受的「哲學」。至於其他科目或課題，當然也很重要，但對於哲學教育的推展，上述幾個議題較容易為學生所接受。我們是在台灣推展哲學教育，不能離開中國式思維模式太遠。

就第二點來說，哲學教育的困境何在？說起來很複雜，苑教授很細膩地舉出台灣傾向於重視應用、喜歡速食類的知識、商業化氣息以及民主化之後的多元與反規範等。這些都是造成困境的原因，不過我想有一個原因更需要了解，而且速食文化、商業文化與應用心態可能都是這個原因的結果，此即是「純理論」的不足。我特別是指理論的能力與理論興趣的缺乏。相對於西方與印度文化來說，中國人及其文化的理論建構能力不算強（這一點也包含純科學理論在內），近代以來則更為虛弱。據我簡單的看法，中國歷史上的玄學、佛學與理學都有很強的理論建樹，但與西方哲學中系統的建立與概念的清晰程度相對比，還有完善的空間。清代是理論虛弱的開始，二十世紀以來的華人承襲祖宗遺產，自然也有類似的掉漆表現（我們不能忘記，當代新儒家的哲學貢獻主要還是藉助於「跨文化對比」）。營造理論的能力不足，在台灣的特殊時空當然更容易轉變成不喜歡理論，甚至反理論，而此即成為實用性知識的溫床。純理論科系在台灣都有類似的困境，更何況哲學是「理論中的理論」。「理論中的理論」的另一個說法是「不實用中的最不實用」，哲學這般不實用，難免陷入嚴重的困境。

至於把解嚴之後的「民主化」與「多元化」視為哲學教育的挑戰，我有一點想法。苑教授認為良好的哲學訓練能夠伸張社會正義與人權，以及提供理性對話的可能性，尤其是



解嚴後的台灣既充滿多元價值，卻又帶出反規範的性格，正是哲學教育可以介入之處。其實我不懷疑哲學可以提供理性思維，但以為超越（廣義的）黨派與偏見並不是容易的事。我甚至認為黨派是無法拋棄的，問題是我們採取甚麼態度。我們要提供的理性平台是過時的啟蒙理想嗎？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考量。

苑教授還提到突破困境的準備與方式，基本上我是贊同的，尤其是適度實用化與社會化的構想，引起我的另一番思考。部分在台灣從事哲學教育的教師們儘管已經將哲學聯繫到其他領域與學科，但可能做得還不夠。哲學本來即應該在不同領域發聲，但一方面是民族原本的反理論性格，另一方面則是我們把餅做小了，所以其他領域對台灣哲學界的關注不多。即使關注哲學，也是直接從外國哲學家及其著作入手，大概不會參考台灣哲學教師的說法。若是如此，怎麼苛求學生們關注哲學？

我當年在德國求學時，隔壁城多特蒙德（Dortmund）大學的哲學系給了我一個想法。它的哲學系只是輔系——不只是可以當做搭配主系的輔系，而是建制上就是輔系。台灣的純理論科系或許可以部分地轉成輔系或學程，這需要台灣民間與教育部產生共識。對我們這些從事哲學研究與教學的人來說，轉成輔系與學程的構想似乎有些悲觀，但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